

试析法国旧制度时期妇女 参与食物骚乱的原因

周立红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妇女是法国旧制度时期食物骚乱的领头羊和主力军, 这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妇女的性别角色使她们担负起维护家庭生计的重任; 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赋予她们在街区里的“公民”身份; 妇女与街区建立起一种亲密的联系, 更容易成为街区共识的代表。以妇女为主体的食物骚乱是法国旧制度时期社会调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了父权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 食物骚乱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家庭经济和街区环境不复存在, 它逐渐被一种超越街区层面、以男性为主体的新的反抗形式所取代。

关键词: 妇女; 食物骚乱; 家庭经济; 街区

中图分类号: K56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1)03-093-098

食物骚乱是法国旧制度时期一种常见的民众反抗形式, 妇女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让·尼古拉(Jean Nicolas)的统计, 在 1661-1789 年间共爆发了 1526 场食物骚乱, 其中有 70.5% 的食物骚乱, 不是唯有妇女参加, 就是妇女的人数超过了男性。^[1] 因此, 一些学者把食物骚乱称作是“女性的领域”。

一、妇女的性别特征

在法国旧制度时期, 面包是民众的主要食物。那时法国的农业还基本上处于“糊口农业”的状态, 能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收益很有限, 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又进一步限制了它的发展, 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农民实行小农耕作模式,^[2] 生产的谷物除去交租、交税, 留足种子, 扣除自家口粮外, 能拿到集市出售的少得可怜。再加上气候变化异常, 经

常会影响到谷物收成, 粮食短缺甚至饥荒是常有的现象。1639 年、1649-1651 年、1661 年、1693 年、1709 年、1741 年、1757 年、1767-1768 年、1770 年、1789 年都爆发过严重的生计危机。^[3]

重要的是, 民众并不会平心静气地把饥荒归为天气原因, 他们反而认为这是商人的贪婪和政府的失职造成的。每当此时, 他们会发动食物骚乱捍卫得到食物的正当权利。1585-1586 年、1630-1631 年、1661-1662 年、1693-1694 年、1698 年、1709-1710 年、1725 年、1739-1740 年、1752 年、1768 年、1770 年、1775 年、1785 年、1788-1789 年都爆发过有大批民众参加的食物骚乱。^[4] 在这种集体行动背后, 蕴含着民众的一种共识, 他们认为食物是共同体的财富, 人人有权获得一份食物维持生计, 这就是生存权。因此, 谷物必须按公平价格出售, 优先满足民众的需求。^[5] 由于

食物供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保障谷物供给,诸如,所有谷物商人必须向司法机关登记姓名和住所,谷物只能在公共集市出售;农民不能在自家谷仓出售谷物,也不能储存谷物超过一定期限而不予出售;集市开放时,应该优先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然后才是商人和面包坊主。^{[6][7]} 政府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民众本已具有的朴素观念,对于政府、农民、谷商、面包师、磨坊主各自在谷物供给链条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有着清晰的认识。E. P. 汤普森在 1971 年发表的《18 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中将民众的这套信念表述为“道德经济”观,他指出:“毋庸置疑,食物骚乱是由物价高涨、中间商人的不法行为以及人们的饥饿引发的。但这些愤恨是在关于市场买卖、磨制面粉和烤制面包等环节中的大众共识内部引发的。这种共识奠基于关于社会规范和义务、共同体内几个群体正当的经济功能的一贯的传统看法上。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穷人的道德经济学”^[8]

在这些捍卫生存权利的食物骚乱中,妇女之所以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正是基于她们的性别特征。

第一,妇女的性别角色使她们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维护家庭生计。在各种类型的社会中,妇女的首要责任是供给食物。中世纪的女圣人就是用食物施行神迹,使别人皈依的。可以说,妇女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掌控食物的权力。^[9] 通常,妇女掌管一家老小的吃喝,她们烧水做饭,去集市买粮,经常面对面地与谷物商人、面包师打交道,对价格的变动最敏感,在判断缺斤少两或谷物是否变质方面有一套办法。^[8] 很多情况下,都是妇女最先察觉到集市上谷价的波动,预感到生计危机的到来,她们刻不容缓地最先站出来发动食物骚乱。例如,1775 年巴黎骚乱中有一个妇女领袖叫马德莱娜·波谢,43 岁,丈夫是熟练泥瓦匠,自己是一个短工。她本来是去集市买粮,到那里后发现谷物很少,群众惊慌失措,于是,她自告奋勇扮演了领袖的角色,自称是“女王”,把群众带到市

郊,到农民谷仓里寻找谷物。^[10]

第二,地方当局对妇女骚乱者的惩罚较轻,使她们免除了一些后顾之忧,也增强了胆量。1767 年特鲁瓦叛乱过后,当局逮捕了 96 个人,其中有 9 名妇女,巴黎高等法院让她们身前、身后带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谷物叛乱者”,到集市示众,^[11] 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对较轻的惩罚了。在 1775 年“面粉战”^[1] 中,政府只逮捕了 93 个妇女,却逮捕了 455 个男人。^[11] 1776 年 9 月在桑斯的骚乱中,一些治安法官看到在约纳码头的船上站着两三百名妇女,一些人打开袋子,另一些人往围裙里装小麦,其余人则拿着袋子。面对此情此景,治安法官们无奈地说道:“我们能对这些妇女做什么呢?”^[11]

妇女受到的惩罚较轻,这主要应归为三个原因。

第一,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妇女被看作是非理性动物,思维混乱,难以驾驭。^[12] 人们谈到骚乱妇女时,常常把她们描述成一群蜜蜂或一堆昆虫,认为性别特征容易造成一时冲动。^[13] 正因为如此,地方当局认为妇女的骚乱行为与政治不沾边,威胁不大。^[10]

第二,妇女有时会带孩子参加食物骚乱。在 1775 年“面粉战”中,妇女领袖马德莱娜·波谢带着 10 岁的孩子参加骚乱。玛格丽特·沙普兰抱着 18 个月大的儿子来到舒瓦西勒鲁瓦集市,她把孩子放在草地上,捡走了洒在马路边的谷物。^[10] 有些妇女带儿童参加骚乱就是为了撕破谷袋后,让孩子帮忙铲起散落在地上的谷物。^[11] 妇女携带儿童的形象为食物骚乱增添了一种温和的家庭色彩,也赋予了这种集体行动一种合法性,使地方当局在怜悯中开始反省自己的作为。

第三,很多妇女骚乱者没有被捕,是因为她们要照顾小孩,是母亲的角色保护了她们。^[14] 在“面粉战”中,一个叫安热莉克·迪比的骚乱妇女被捕后,她所在的梅吕教区的牧师请求释放她,理由是她“要养活五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10]

由于妇女受到的惩罚较轻,参加骚乱的男人

¹ 1775 年 4 月 27 日到 5 月 10 日,由于谷物歉收,谷价高涨,一场食物骚乱波及整个法兰西岛、东诺曼底、南皮卡第、香槟西部地区和北奥尔良,规模空前,史称“面粉战”。

有时也会装扮成妇女, 希望从对方的性别中获得一些好处。1789年10月5日, 当一大群妇女跑到凡尔赛把国王和王后押回巴黎时, 书商哈迪看到人群中一个男人装扮成女人。^[15] 在18世纪70年代, 博若莱的农夫把脸抹黑, 打扮成女人, 然后袭击了为新的地主丈量土地的测量员。早晨, 警察赶来询问时, 农夫的妻子们一无所知, 说攻击者是从山里不时前来的仙女。在英格兰的食物骚乱中, 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1629年, “上尉”艾丽斯·克拉克率领一群女人和装扮成女人的男纺织工人在位于埃塞克斯的莫尔登制造了食物骚乱, 洗劫了一只往荷兰运送谷物的船只。^[12] 这种“性别倒错”现象是对食物骚乱具有的女性特征的肯定。

二、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

妇女在食物骚乱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源自于她们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家庭经济是一个历史术语, 用来描述欧洲前工业化时期下层人民家庭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结构。那个时期, 妇女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主妇, 洗衣、缝补、烧饭、带孩子只是一个女人干的边边角角的活, 她们还要和丈夫共同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通常, 夫妇二人全职工作才能供养父母和两、三个孩子, 而且, 七岁大以上的孩子也需要做些辅助工作。^[16]

在城镇, 职业妇女的人数日益增多, 她们中有亚麻布商人、呢绒布商人、绸缎商人、谷物经纪人、行会师傅、客栈或酒店老板娘。在圣马洛, 1621—1654年间, 18%—28%的布商是妇女, 1701—1706年间, 这一比例上升到56%。1638年在盖朗德, 43%的酒店主人是妇女。通常, 丈夫是鞋匠或桶匠, 妻子开一个酒馆, 专门为那个行业的工匠或街区的居民服务。^[17]

在农村, 已婚妇女参与种地、收割庄稼、打谷, 此外, 她们还要饲养家禽, 种果树, 大多数时候是由她们到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 卖了钱交地租。^[17] 在一些乡村工业发达的地方, 妻子在家庭作坊里为丈夫纺纱。在很多地方, 家庭生产不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 男人要外出做工。奥弗涅地区的男人春秋去法国北部和东部清扫烟囱、挖土、送水、采摘桑树叶, 而他们的妻子则留在家做事。

有的家庭父亲一年有9个月时间在外, 母亲成为家庭的支柱, 除了耕作和收获, 她还要做出一系列重要决定, 甚至会借债带领整个家庭度过父亲缺席的日子, 直到拿到父亲的汇款化解危机。^[16]

在家庭经济中, 还有两类妇女群体值得关注, 这就是未婚女孩和寡妇。对于城市家庭的未婚女孩来说, 如果她的家里开有烹饪店、酒馆, 摆有鱼摊或蔬菜摊的话, 她可以留在家里帮忙; 对于农村女孩来说, 只有少数人能在当地农场找到活干, 大多数人需要去附近的城镇打工, 她们或者当住家苦力, 清洗衣服、运送蔬菜和做饭; 或者参与家庭工业的生产。在米约, 手套生产占据了一个仆人一天大部分时间, 在巴约或迪耶普, 大概三分之二的女仆制作缎带。这些家庭除了给女仆提供膳食外, 还支付一定数额的工资。^[16]

寡妇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很多寡妇在丈夫去世后继续经营家族企业, 在城镇, 寡妇能继承丈夫的师傅身份, 在某些行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村, 寡妇继续经营农场, 在诺曼底的圣康德布耶村, 4个寡妇都有土地耕种。如果算上租种的, 她们总共掌控了该村8.5%的土地。在整个法国, 大概有10%的农村土地是由这样的寡妇耕种的。^[17]

妇女正是由于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才在食物骚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具体说来, 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 在旧制度时期, 家庭经济的主要功能在于谋生, 根据拉布鲁斯的统计, 在1721—1791年间, 工薪阶层要把50%的预算用在购买面包上; 在1789年饥荒和价格高涨时期, 这一比例高达88%。^[18] 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她们承担起了谋生的重任, 一旦食物供给不足, 她们会发动食物骚乱保护整个家庭免受侵害。在1775年“面粉战”中, 政府逮捕的妇女骚乱者中有16名妇女领袖, 其中15名是已婚妇女, 她们大都三十大几或四十出头, 有几个未成年孩子。被捕的妇女中有一些未婚女孩, 她们大都二十出头, 最年轻的两个女孩十五六岁, 是陪同母亲参加骚乱的。22岁的德塞参加骚乱是因为她的寡母要养活5个孩子。^[19]

第二, 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赋予她们在街区的“公民”身份, 使她们得以走出家庭充分地社会化, 由此得以与其他妇女建立亲密关系。在农村, 妇女们往往结伴挑水和去集市上卖农贸产品。^[19] 在城镇, 职业网络和街区网络有时是互相重叠的, 干同一份工作的人, 往往在同一个街区、甚至在同一条街道工作和吃住。^[20] 妇女如此深入地参与到家庭经济中, 增加了她们在街区出现的机会。这为她们发动食物骚乱这种集体行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三, 夫妻双方在家经济中没有差异的经济地位使男女之间形成了通力合作的关系, 他们把这种平等互助的关系模式移植到了食物骚乱中。通常, 女人冲锋在前, 男人随后跟上来。1766年9月在桑斯的食物骚乱中, 一个目击者“见到妇女和孩子装运小麦; 男人们呆在河岸负责护送, 或者是等到天黑时帮助她们”。^[1] 在1775年“面粉战”中, 在亚眠南部的集市上, 7个妇女正拿刀子费力地劈开卖主的谷袋, 这时, 两三个男人加入进来, 他们一起迫使镇长估算谷物的价格, 然后低价卖给民众。^[11]

三、妇女与街区

食物骚乱是一种集体行动, 参加者少则两三人, 多则几千人。¹ 与工业社会的罢工不同的是, 这种前工业社会的集体行动多是发生在由熟人构成的街区里。1725年7月9日发生在巴黎圣安托万区的袭击面包坊的骚乱中, 目击者认出有一个木工和妻子, 一个卖火柴盒人的儿子, 一个皮鞋匠和儿子, 一个马夫, 一个短工和妻子, 一个警卫队士兵的妻子, 还有很多街区的妇女。^[21] 对于农村的骚乱者来说, 如果集市的官员叫不出某个骚乱者的名字, 他可以通过骚乱者的村民辨认出他来。在1775年“面粉战”中被捕的骚乱者中, 只有15%的人在监狱中找不到自己的村民。^[11]

妇女之所以在食物骚乱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是因为她们与街区建立起一种亲密联系, 更容易成为街区共识的代表。

在城镇, 职业网络和街区网络很多时候是相互重叠的, 正如上文提及的, 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多住在同一个街区, 在生活工作中形成了紧密的纽带。他们会一起出摊, 一起回家, 甚至中午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就餐。由于妇女多是从从事纺织品工业和奢侈品工业, 对技艺要求较低, 大部分计件工作是在家里完成的, 这更利于她们形成紧密的邻里关系。例如, 在巴黎, 一个纽扣制作商雇佣66个妇女工作, 除了3个妇女外, 其他人都把活拿到家里做。巴黎大都是三到六层的楼梯房, 女人在家里时往往开着门, 每个上下楼梯的人会不自觉地往屋里扫一眼, 停下来聊聊天。如果手里的活可以带走的话, 她们会拿到邻居的房间, 或来到院子里, 站到门口做, 这样缝衣或纺纱时还可以有个伴。妇女们正是在这样的日常接触中建立起了较为亲密的关系, 如果某个妇女没有足够的厨房设备, 她会跑到邻居家做饭。她们还互相帮忙照看孩子, 1752年圣诞节刚过, 一个屠夫的妻子需要一大早赶往店铺, 就让一个女邻居帮孩子穿衣起床, 再送他上学。^[22]

在农村, 妇女之间也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妇女晚间有夜聊的习惯, 她们聚在一起, 一边纺纱, 一边唱歌和讲故事。^[23] 她们在烧水做饭、赶集、节庆、娱乐和游戏活动中也会互相往来。这些交往形式有助于妇女之间形成一种互助关系, 她们互相借钱, 在接生、生病和带孩子方面互相照料。^[19]

妇女在邻里之间形成的这种交往网络使她们有了比男人更强的共同体意识, 有了一种以所有人的名义行动, 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情感。1759年10月, 在马孔, 一个妇女质问她的邻居们为什么迟迟不加入到她们的队伍中来时如此说道: “你们倒很镇定, 我们可是为你们找食物去的”。^[11]

食物骚乱这种街区层面的集体行动正是借助于妇女之间的网络发展起来的。在1775年的一次骚乱中, 38岁的卡特林娜·克莱弗耶, 一个做丝带的女工, 成了这个网络的核心, 她靠滚雪球似的熟

¹ 在“面粉战”中, 某些乡村的食物骚乱最少有两三个人参加, 大规模的食物骚乱参加者多达几千人, 例如在Vernon的骚乱有6千多人参加。参见Cynthia A. Bouton, *The Flour War, Gender, Class, and Community in later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p. 99.

人关系,把周围众多的妇女吸收到食物骚乱中。卡特林娜先是从埃梅里的妻子,一个在尚布利卖布的商人那里听到前一天发生了抢劫的消息。她便把这一切告诉了玛德莱娜·卢埃特,她是猎场看守人弗朗索瓦·傅立叶的妻子,玛德莱娜·卢埃特然后和玛丽·苏珊娜·多德里一块吃午饭,后者是梅鲁的马商和酒店老板皮埃尔·勒格罗的妻子。两人后来追随卡特林娜参加了集市骚乱。梅鲁的熟练铁匠皮埃尔·勒迈尔的妻子玛丽·安娜·博韦以及牛商让·马比勒的妻子玛丽·安娜·勒费弗也和卡特林娜到了集市,帮她把弄来的谷物带回去,并和她一块分了。与此同时,一个卖种子的女人、手工艺品工匠的妻子苏珊娜·芒达和她16岁的女儿在集市上认出了勒费弗,于是便效仿她行事。^[11]

很多情况下,食物骚乱也会这样爆发:先是一个妇女与面包师或谷物商人发生争执,然后围观的妇女们深受鼓舞,决定加入到她的“正义”事业中,于是众人一起袭击面包坊或谷物货栈。1725年6月23日,一个街区的女人,细木工匠德雅尔丹的妻子走进沙里耶位于圣安托万区的面包坊,她掏出12苏要买一块4磅的面包。当时照看面包坊的是沙里耶的妻弟拉多,拉多拒绝了,德雅尔丹妻子开始骂他,拉多让她离开,德雅尔丹妻子说:“既然你不愿意以我的价格卖给我一块面包,我就不掏钱把它带走了”。她边说边抢了一块面包往门口走。拉多不让她走,他的妹妹和两个短工也加入进来。双方互相殴打、辱骂起来。“拿起它走吧!”面包师太太给她投了一块面包,轻蔑地说道。德雅尔丹妻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她拒绝这样做,声称她不会不掏钱就拿走一块面包。这时,聚集到门口的邻居把德雅尔丹叫来了,他的第一直觉是要批评妻子惹是生非,要把她带回家。这时聚集起来的一百来个女人不顾一切捍卫她。“她没有错”,她们纠正她的丈夫,“这都是面包师的错”。由于受到这些女人的鼓励,德雅尔丹妻子开始往面包坊投石块。群情进一步激发起来,大家一拥而上围攻了面包坊。^[12]

四、结论

透过对妇女参与食物骚乱原因的分析,我们

发现,虽然在法国旧制度时期,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她们在经济事务上以及择偶方面的权利都受到限制,^[17]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层面,她们在家庭经济和街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是家庭生计的捍卫者,是连接邻里关系的纽带,是街区共同利益的代言人。食物骚乱看似是一种社会脱序的形式,但正是由于妇女的积极参与,它对旧制度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第一,妇女发动和参与食物骚乱是源于她们维护家庭生计的母性的责任感,这一点容易引起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群体的共鸣,有助于使民众的呼吁为社会不同阶层所接受,地方当局据此迅速做出反应,降低谷物价格,恢复教区济贫和慈善机制,使食物骚乱以和平的方式平息下来。斯蒂文·卡普兰认为,在食物骚乱中,一部分精英与平民之间存在一种“合作”形式或一种“协议”,^[24]如此看来,妇女对这份“协议”的达成功不可没。

第二,妇女和儿童的参与给食物骚乱蒙上了一层温和的色彩,将这种很容易导致社会大动荡的集体行动限定在传统的民众抗争的范围内。妇女在食物骚乱中呼吁国王恪守父亲的职责,要求面包师、商人、磨坊主各就其位,其实捍卫的是父权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有助于险些陷于瘫痪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也正因为如此,食物骚乱成为法国旧制度时期社会调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妇女多从事一些低薪的不熟练工种,与男人的职业差距拉大,给妇女提供责任感和尊严的传统家庭经济模式趋于瓦解。一些新兴的大型工业化城镇的出现使食物骚乱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和街区环境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食物骚乱逐渐演变成一种过时的、边缘化的抗争形式,代之而起的是那种超出街区层面、建立在工会组织基础上的游行、罢工,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男人而不再是妇女。由此可见,以妇女为主体的食物骚乱是法国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

[本文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091-07)、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育苗工程)(批准号:wym0900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 [1] Jean Nicolas. La rébellion française,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1661- 1789[M]. Paris: Gallimard, 2008. 401- 403, 406, 405, 424.
- [2] (英)古德温, 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8 卷: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1763- 1793 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773- 774.
- [3] Andrew B. Appleby. Grain Prices and Subsistence Cri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 1590- 1740[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9(4): 865.
- [4] Cynthia Bouton. Les mouvements de subsistance et le problème de l'économie mor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J].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000(1). <http://ahrf.revues.org/document104.html>.
- [5] Hilton L. Root. Politiques frumentaires et violence collective en Europe au XVIIIe siècle[J].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90(1): 168.
- [6] CL. - J Herbert. Essai sur la police générale des grains, sur leur prix et sur les effets de l'agriculture[M]. Paris: Librairie Paul Geuthner, 1755. 5- 6.
- [7] Édgar Faure. La disgrâce de Turgot, 12 mai 1776[M]. Paris: Gallimard, 1961. 209.
- [8] E. P.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J]. Past and Present, 1971(50): 78- 79, 116.
- [9] Carole M. Counihan. Family identity, food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Florency[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88(2): 52, 54.
- [10] Cynthia A. Bouton. Gendered Behavior in Subsistence Riots: The French Flour War of 1775 [J].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0(4): 736- 737, 747, 737, 749.
- [11] Cynthia A. Bouton. The Flour War, Gender, Class, and Community in later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M].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4, 90, 187, 193.
- [12] Natalie Zemon Davis. Women on Top[A].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C].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4, 147- 148.
- [13] Arlette Farge. Evidentes Émeutes[A]. Natalie Zemon Davis et Arlette Farge, ed.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XVIe- XVIIIe siècles[C]. Paris: Perrin, 2002. 566.
- [14] Michelle Perrot. Mon histoire des femmes[M]. Paris: Seuil, 2006. 201.
- [15] Olwen H. Hufton. Women and the Limits of Citizenship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M].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17.
- [16] Olwen Hufton. Women and the Family Econom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J].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75(1): 18, 4, 10- 11, 16, 3- 4.
- [17] James B. Collins. The Economic Role of Wome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J].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89(2): 439, 458, 461- 462, 442, 458, 448, 451, 466.
- [18] George Rudé.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Popular Protest[M].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1. 165.
- [19] John Bohstedt. Gender,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politics: Women in English Riots 1790- 1810[J]. Past and Present, 1988(1): 95, 98.
- [20] David Garrioch. Neighbourhood and Community in Paris, 1740- 179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2.
- [21] Steven Laurence Kaplan. The Paris Bread Riot of 1725[J].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85(1): 30, 28- 29.
- [22] David Garrioch. The Everyday life of Parisian Women and the October Days of 1789[J]. Social History, 1999(3): 237, 239, 241.
- [23] (英)伯克.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 杨豫、王海良,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9.
- [24] Steven Laurence Kaplan.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vol. 1[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196.

[责任编辑: 翟宇]